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第一辑

# 汉唐《史记》 研究论稿

杨海峥 著



齊魯書社

K 204.2  
Y 199

杨海峥◎著

# 汉唐《史记》 研究论稿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第一辑



BJ11/03



\*20021173\*

齐鲁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唐《史记》研究论稿/杨海峥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03. 6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5333-1135-3

I. 史... II. 杨... III. 史记-研究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804 号

## 汉唐《史记》研究论稿

杨海峥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2 插页 230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135-3

K·326 定价: 18.00 元

## 总 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是一套学术研究专著。它注重对中国的古代文献(包括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以古代文献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的探求与思考。其中,有从古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典籍、文献的专门研究,也有在古代文献、古代典籍研究的基础上,多方位、多视角地审视典籍,审视中国文化,探求典籍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探究它们的结合点。它立足于中国古代的典籍,立足于中国古代的文献,力求体现对古文献研究的特色,倡导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学风,并且提倡有新的切入点,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出有质量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是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和组织的。作者队伍的主干力量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 25 所大学的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教学、科研机构中的学者和若干家在全国有影响的出版社的专家。同时,也吸收全国各相关学科的学者的符合于这套丛书宗旨的学术研究专著。

这套丛书的书稿将在编委会、学术委员会和出版社分别审定合格之后分批推出。

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在此谨致真诚的谢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3 年 4 月 15 日

## 引言

《史记》问世以来,受到了历代学者的重视。西汉时期,《史记》开始流传不久,就有学者引用《史记》的文字,并出现了十几家续写《史记》之作,可见《史记》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武帝以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史记》由于思想倾向不完全符合儒家思想规范,所以不断受到批评,西汉末扬雄在肯定《史记》“实录”的前提下,又提出《史记》“是非颇谬于经”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史记》的普遍看法。

东汉,班固在其父班彪所撰《后传》数十篇的基础上,吸收《史记》之长,写成了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汉书》在体例和内容上都受到《史记》很大影响,而在思想上则更加符合儒家正统的思想要求,所以《汉书》出现后,很快在社会上流行,且备受称赞。随着《汉书》的流行,作为纪传体史书开创者的《史记》也进一步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可以说,《汉书》的出现客观上扩大了《史记》的影响。此外,班彪、班固父子还对司马迁的思想及《史记》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的评论,其中很多观点都成为后代《史记》研究中的焦点问题。除班氏父子外,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在《论衡》中也多处提到《史记》,评论涉及《史记》的思想及具体篇章设立等方面。“疾虚妄”是王充治学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其《史记》评论最突出的特点。在《论衡》中,王充还提到了班彪的《后传》与司马迁《史记》的优劣比较,这可以算是对马、班优劣比较的最早涉及。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的繁荣和文、史分野的明确,使史学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有了长足的发展,史书的数量大大超过前代。这

一时期的史家和学者重点从体例方面对《史记》进行分析,并将对《史记》体例的借鉴和学习体现在各自史书编纂的实践中,使得这一时期出现了纪传、编年、断代、通史等多种史书著作形式。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史记》思想、风格、内容、体例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论,可作为这一时期《史记》评论的代表。由于魏晋南北朝是汉语由上古到中古发展的重要转变阶段,语音和词汇都有较大的变化,再加上人们对《史记》重视程度的提高,这一时期出现了很有价值的《史记》注释之作,如徐广的《史记音义》、裴骃的《史记集解》,至今仍是人们研读《史记》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这些注释之作的出现,又为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史记》提供了方便,促进了《史记》的传播和流行。这一时期《史记》的地位较汉代时有所提高,由张辅、傅玄正式开端的《史记》、《汉书》的优劣比较,成为后代《史记》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唐朝建立后,为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君臣上下都很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随着“以史为鉴”的风气形成,国家专门设史馆修史,史臣们在前代学者基础上,对史书编纂体例和方法作了全面总结,对纪传体和编年体各自的优劣也有了较明确的认识。特别是刘知几《史通》从史书发展源流的角度对《史记》的体例、思想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论述,虽也有不少批评,但充分肯定司马迁开创纪传体之功,正式确立了《史记》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文学方面,唐代逐渐改变了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史记》以其古朴自然的语言风格受到了唐代文学家们的重视,韩愈、柳宗元等文学家在倡导“古文运动”时,将《史记》作为散文的典范之作来学习,并开始关注《史记》文学方面的特点。唐代科举考试曾将《史记》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推动了人们对《史记》的深入研读。这一时期出现的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是《史记》注释的里程碑,与裴骃的《史记集解》一起被称为“《史记》三家注”,这两部著作对《史记》的文字和内容作了全面的考证和注释。诸多因素合在一起,使《史记》的受重视程度有了空前的提高。可以说自唐代开始,《史记》确立了其在中国古代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宋代初年的《史记》研究,主要是继承汉唐之余绪,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学术界疑辨之风兴起并蔓延,出现了怀疑注疏乃至经书,探求义理的普遍倾向,这就是传统所说的宋学。受这种学风的影响,宋代在对前代《史记》研究成果进行考证辨析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对《史记》史学特点和文学特点的评论。宋代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虽然不多,但在当时学者的著作和文集中却有许多针对《史记》的评论,而且评论内容涉及《史记》的各个方面。其中郑樵在《通志·总叙》中对司马迁首创纪传体通史给予极高的评价,对进一步提高《史记》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这一时期,出现了倪思的《班马异同》等比较《史记》、《汉书》优劣的专门著作。文学方面,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为代表的文学家,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大力倡导学习《史记》,进一步提高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外,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宋代刊刻的《史记》版本有三十多种,《史记》刻本随处可见,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进一步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学者继承宋代评论《史记》之风,致力于对《史记》进行摘抄和评论,而其评论的重点主要是《史记》文字叙述和篇章结构等方面的特点。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史记》评点之作,其中凌稚隆的《史记评林》130卷对前代的《史记》评论网罗甚富,为后代《史记》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以评点的形式对《史记》进行文学方面的评论可以说是明代《史记》研究的主要特点。归有光的《归震川评点史记》一书,从叙事特点、文章气势等方面评点《史记》,明清两代的文学家对此书评价极高。这一时期出现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文学家都对《史记》推崇备至,明代也出现了一些《史记》考证之作。

清代是《史记》研究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在《史记》考证和评论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清代学者在继承前代《史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学史上许多焦点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讨论。在考订、辨伪、校勘、训释、补作、辑佚以及《史记》评论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力作,如牛运震《史记评注》、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杭世骏的《史记考证》、崔适的《史记探源》、吴见思的《史记论文》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史记》研究的成就。

从以上对历代《史记》研究特点的勾勒中可以看出,自汉至清,对《史记》的研究一直前后相承,并在不断深入,而且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不同时期的《史记》研究,其特点与方向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自汉至清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众多学者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史记》研究成果,面对如此厚重的积淀,将历代的《史记》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之为“《史记》学”是毫不为过的。我们今天在对《史记》作更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同时,也非常需要对历代的《史记》研究情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因为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史记》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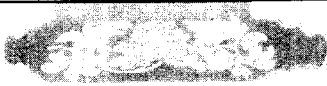
现当代的《史记》研究者已对历代《史记》研究情况作了很多研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57 年编印了《〈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在此基础上,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了由杨燕起、俞樟华编的《〈史记〉研究资料和论文、专著提要》,这两本书对汉至清的《史记》研究专著及有关资料作了较全面的整理,为我们查考《史记》研究的资料提供了线索。1986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的《历代名家评〈史记〉》,将历代学者对《史记》的评论分类编排。此外,由俞樟华、张新科所编的《史记研究史略》将历代《史记》研究的特点及成就作了概括和总结,这也是目前唯一一本研究“《史记》学史”的专著。另外,在一些现当代学者的《史记》研究著作及论文中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情况也多有提及。但一般都是对某一个时期的《史记》研究状况,或某一种《史记》研究专著进行研究,而对整个《史记》学史的总体把握则较少。

笔者试图按照朝代顺序将自汉至清的《史记》研究情况及其重点作一整理,以便从中发现《史记》研究发展的轨迹,清点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进一步开拓今后《史记》研究的领域。但在接触材料之后,才真正意识到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史记》研究材料实在是太多了,每个朝代都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各研究者除其研究《史记》的代表作外,还有很多零散的《史记》研究成果。以自己的学力,要在短时期内将这些材料进行全面清理是力所不及的,我所能做到的是,在每个朝代挑选其有代表性的成果及观点进行论述,并力求通过对这些成果的研究来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学术特点及《史记》研究的特点。

由于时间有限,这篇论文只做到唐代,对宋代至清代的《史记》研究状况的整理留待以后完成。但仅就对自汉至唐这一阶段《史记》研究成果的整理而论,也尚存在很多疏漏谬误之处,敬请各位先生指正。

## 目 录

|                            |     |
|----------------------------|-----|
| 总 序 .....                  | 1   |
| 引 言 .....                  | 1   |
| 第一章 汉代的《史记》研究 .....        | 1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1   |
| 第二节 《史记》流传中的几个问题 .....     | 4   |
| 第三节 扬雄对《史记》的评论 .....       | 21  |
| 第四节 王充对《史记》的评论 .....       | 32  |
| 第五节 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论 .....     | 49  |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的《史记》研究 .....     | 72  |
| 第一节 时代特点及各家对《史记》的评论 .....  | 72  |
| 第二节 《文心雕龙》中有关《史记》的评论 ..... | 87  |
| 第三节 研读和注释《史记》 .....        | 109 |
| 第三章 唐代的《史记》研究(上) .....     | 123 |
| 第一节 唐代史学的发展及对《史记》的评价 ..... | 124 |
| 第二节 唐代文学家以《史记》为效法的典范 ..... | 131 |
| 第三节 司马贞《史记索隐》 .....        | 136 |
| 第四节 张守节《史记正义》 .....        | 159 |
| 第五节 三家注的形成及其影响 .....       | 168 |
| 第四章 唐代的《史记》研究(下)           |     |
| ——《史通》对《史记》的评论 .....       | 177 |
| 第一节 对《史记》体例的评价 .....       | 180 |
| 第二节 对《史记》思想的评论 .....       | 200 |



|                        |     |
|------------------------|-----|
| 第三节 对《史记》叙事方面的评论 ..... | 208 |
| 第四节 《史通》的价值及其缺点 .....  | 236 |
| 主要参考文献 .....           | 241 |

## 第一章 汉代的《史记》研究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两汉四百年学术的发展也随时代变化而具有不同的特点。汉初在长期战乱之后,需要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所以朝廷推行清静无为的政策,与民休息。在目睹秦朝灭亡的过程之后,当时人们也充分意识到以古为鉴的重要性。据《史记·酈生陆贾列传》记载,在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陆贾撰《新语》指出,汉王朝必须以秦亡为鉴戒,施行仁政,实行无为而治。陆贾的主张深刻地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生产的紧迫要求,所以得到高祖和群臣的赞赏,并奠定了汉初几十年间无为而治的理论基础。直到东汉初年,王充对《新语》仍给予很高的评价,说:“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

圣之言,不能过增。”<sup>①</sup>生活在文帝时代的贾谊对秦亡教训作了更为系统的总结,他在《过秦论》中深刻地剖析秦朝成败兴亡之理。司马迁对《过秦论》由衷称赞:“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sup>②</sup>并在《秦始皇本纪》及《陈涉世家》中大段引用了《过秦论》的原文。与贾谊同一时代的政治家贾山写有《至言》,在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人主不得闻其过失”,“则社稷危矣”,“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的结论。<sup>③</sup>可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朝者提供鉴戒已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这种重视反思历史,以史为鉴的做法对司马迁也产生很大影响。

西汉初年,在文化学术方面,政府一般不加以干预,因而自汉初至文、景及武帝前期,仍然延续了战国时期各家学说互相交流融会,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与西汉国力处于上升时期相适应,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呈现出一派蓬勃的生机,《史记》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到武帝时,采纳董仲舒提出的“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sup>④</sup>的建议,把不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各家学说都作为罢黜压制的对象。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其后,汉宣帝召集群臣在石渠阁论经,并亲临决断,定五经异同。东汉章帝在建初四年(79年)召开白虎观会议,将谶纬与今文经学混为一体,作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并将强调“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纲纪”等集政治、道德、伦理为一体的种种规定都写进《白虎通义》中,明显加强了对人们思想

---

① 《论衡·案书》,《论衡校释》,[汉]王充著,黄晖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汉书·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④ 《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的钳制。东汉时期,儒学与阴阳五行和谶纬学说相结合,使得阴阳灾异说和谶纬迷信在当时社会上广为流行。这一时期,有一些有见识的学者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不妄论灾异,重视人事,重视总结政治成败经验的传统,对唯心迷信的谶纬学说作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批判。这在王充、桓谭等学者对《史记》的评论中也有所反映。<sup>①</sup>

西汉王朝建立后,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已注意到史书编纂的重要性,但史官的政治地位与治经的儒生相比还是相差很远的。西汉时期,经学的繁盛为历史著述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材料及著作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为史书的编纂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经学的繁盛及儒家思想的独尊又使史学始终处于经学附庸的地位,不利于史学的独立发展。在充分利用经学著述的资料和形式的同时,史家们也大多以五经为标准,将自己的史著视为经学的辅翼和对经学的解说。

西汉后期,随着儒家经学独尊地位的确定,史书编纂更加成为经学的附庸。当时从事史书编纂的学者,主要也是以治经为主的。如褚先生就是以经术为郎,后为博士,并师事大儒王式。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说续写《史记》者都是“并以别职来知史务”,太史公一职已名存实亡,只是执掌四时星历之事,这对史学发展是没有好处的。西汉末扬雄力倡宗经,对儒家经典极力推崇,虽然他曾校理群书,续写《史记》,并肯定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但又对司马迁及《史记》不完全符合儒家经典学说多有微词。

东汉初年,儒家思想已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同时东汉也是史学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史学著作呈现初步繁荣,史书类别比先秦时期明显增多,其中便有对史籍和史事进行评论的史评。东汉史学虽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依然笼罩在经学的影响之中,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收入“六艺略”的“春秋类”中,居于六艺之末。直到魏晋南北朝时,儒家统治地位被动摇,史学才从经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得到飞速发展,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但整个封建社会中,经学对史学的影响始终存在,只

<sup>①</sup> 参见《后汉书·桓谭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是不像两汉时期那么突出罢了。

两汉时期的《史记》研究虽然刚刚起步,却已对《史记》的思想、取材、体例等许多方面进行了评论,虽大多只是简单提及,没有作进一步深入的讨论,但对后代《史记》研究很有启发,后代史记学研究基本上是围绕汉代提出的问题进行的,并在其基础之上,不断有所开拓。这一时期的《史记》评论的代表人物是扬雄、王充、班彪、班固,其中扬雄提出“实录”、“爱奇”等说法,王充所提出的班彪《后传》优于《太史公书》的评论,班彪、班固对《史记》体例、风格、思想等方面的批评,都对后代《史记》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一些东汉学者对《史记》有零星的评论。如张衡,《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奏上司马迁、班固所记史事与典籍不合的十余件,其中有一条为:“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可见当时学者对远古的历史很关心,并要求在史书中有所著录。

《后汉书·张衡传》中还记载,张衡作《应间》,其中提到:“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长谍之,烂然有第。”章怀太子注:“司马迁字子长,作《史记》,著功臣等传,烂然各有第序也。”称赞《史记》为功臣立传,叙事清楚有序,各有特点。

东汉刘毅也进一步提出作史要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主张:“臣闻《易》载羲农而皇德著,《书》述唐虞而帝道崇。故虽圣明,必书功于竹帛,流音于管弦。”“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夫道有夷崇,治有进退,若善政不述,细异辄书,是为尧、汤负洪水、大旱之责,而无咸熙、假天之美。”<sup>①</sup> 强调没有史书的记载,君王的业绩就不能彰扬。

## 第二节 《史记》流传中的几个问题

### 一、残缺和续补

两汉时期,是《史记》成书、传播和学者们开始对其进行研究的时

<sup>①</sup> 《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期。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总结自己作史的情况时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司马贞《史记索隐》对此的注释为：“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他认为司马迁所说的“名山”是指皇家藏书之地。尽管后人对司马迁所说的“名山”、“京师”的含义有不同的认识，但大多根据司马迁这段自述认定《史记》最初完成时有司马迁手定的正副两本。

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这里提到司马迁去世后“其书稍出”，并将其与杨恽“遂宣布焉”相对而言，可见《史记》在司马迁去世后不久，就慢慢在民间流传，但正式将《史记》一书公之于世却是在宣帝时由司马迁外孙杨恽完成的。《汉书·杨敞传》后附的《杨恽传》中记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杨恽认真研读《史记》，并献出家中所藏的《史记》原本，促进了《史记》的传播，扩大了《史记》的影响，为学者们提供了对《史记》进行学习和研究的条件。

西汉朝廷对《史记》控制很严，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载，成帝时，东平思王刘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这说明到成帝时，诸侯王想读《史记》，还要向皇帝呈请。《汉书·叙传》记载班固仲祖班固博学多才，与刘向同校秘书，成帝很欣赏和器重他的才能，为表示嘉奖，“赐以秘书之副”，其中就包括《太史公书》，因当时“时书不布”，与东平思王求《太史公书》未获批准相比，整个班氏家族都为此感到荣耀。由此可见在西汉要见到《史记》还不是件很容易的事。由于《史记》篇帙

巨大,再加上个人需要不同,所以当时《史记》经常是单卷别行,《后汉书·窦融传》记载光武帝非常赏识窦融,“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这是见于记载的《史记》单篇流行的开始,《后汉书·王景传》中也记载明帝时因王景治水有功,就赐他《河渠书》。可见在汉代《史记》常常是单卷别行的,这也是后来《史记》篇章散乱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史记》记事截止汉武帝时期,随着《史记》的流传,开始有人续写《史记》未涉及的武帝以后的西汉史,东汉出现的续写《史记》之作就有十几家。另外,由于《史记》在流传中有残缺,汉代也出现了以褚少孙为代表的补缺之作。续写与补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对《史记》记事下限的延伸,一个是对其篇章残缺错乱的纠正和补充,其出发点是有所不同的。

据《后汉书·班彪传》记载,班彪认为:“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于是班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王充《论衡·须颂》中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提到扬雄曾续写《史记》未记载的西汉宣帝至哀帝、平帝时期的历史,可惜今天扬雄所续写的《史记》已不传。今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太史公曰”中讲:“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司马迁作《史记》时不可能收入生活在东汉的扬雄的评论,这段话为后人所加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扬雄所续加,就不得而知了。

除班彪提到的几个好事者之外,《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下还著录了“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据颜师古《汉书注》“(商)后事刘向”,冯商是刘向的弟子。韦昭注中也提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又讲:“《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